

蘇聯民族模式：駕馭民族主義的歷史實驗



蘇聯民族模式在世界歷史佔據重要地位，其形成是傳統帝國秩序面對民族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衝擊的回應。蘇聯建立的背景是世界性的帝國危機。由於工業革命、世俗化祛魅、君主制危機、民族主義崛起等因素，帝國作為一種政治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戰。各大傳統帝國都在尋求應對平衡策略，既要積極回應殖民地精英的民族主義訴求，又要盡可能保持疆域統一。由此衍生的帝國保存方式多種多樣，並大體分為三種路徑，第一種是「民族化帝國」，以原先的核心族群為基礎，或拓展其概念、或發明「帝國民族」(imperial nation)，把帝國整合為類似單一民族國家的新單位，比如法國^①。第二種是「聯邦化」，允許殖民地以多種形式自治、自決，同時通過邦聯、貿易協定等方式留在原宗主國範圍內，規避硬脫鉤造成的經濟社會混亂^②；特定形勢下，原帝國的核心與邊陲甚至可以組成較為平等的姊妹聯合體，比如奧匈帝國和葡萄牙—巴西二元王國^③。第三種方案則是基本保留帝國結構，從種族和生物觀念區隔於其他族群的核心民族，以此確保對邊陲的絕對控制，比如德意志帝國^④。蘇聯民族模式借鑒了上述三種模式的元素，但不同於任何一種，並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後殖民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具有獨特的世界歷史意義。

蘇聯民族模式具有幾個關鍵要素：一、族群民族化：將原先沙俄帝國境內的族群識別或重新建構為民族，由蘇維埃國家為其發展特定的民族語言，

* 本文係筆者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蘇俄革命中的族群與民族》課程講義修改而成。感謝趙鼎新教授對本文的修改意見，以及羅禕楠教授的評論。感謝布朗大學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哈佛大學 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提供的圖書館資源支持。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帝國政治與民族主義」和中央高校科研基本業務費青年項目「關於蘇聯民族模式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資助。

定義民族風俗和文化藝術；二、領土化：為各個民族劃定領土，包括把原先散居在各地的被劃為同一民族的人遷入一地集中居住，並建立自治單位，這些自治單位既可以是加盟共和國，也可以是加盟共和國下屬的民族自治共和國、自治州；三、本地化：民族區域重點培養和任用本民族幹部，通過強調其民族身份來推行國家政策；四、集中化：民族自治僅限於語言文化和特定經濟技術層面的法律問題，各民族在政治上嚴格服從列寧主義原則，因此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聯邦制；五、去俄羅斯化：對俄羅斯人和俄羅斯文化進行限制，在俄羅斯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最大的一個) 內部建立了多個非俄羅斯共和國和自治區，允許非俄羅斯族群採用本民族語言教育和出版^⑥。去俄羅斯化集中顯示了蘇聯民族模式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連續性：蘇聯沒有否定和取消俄羅斯族，但採取了實質性制度設置來遏制俄羅斯的民族國家化。

本文分三部分介紹蘇聯民族模式的歷史。第一部分解釋蘇聯民族模式的革命歷史起源，並進一步闡釋這一模式的核心特徵。第二部分解釋蘇聯民族模式在革命後的延續，重點說明蘇聯的雙重反向運動。第三部分分析蘇聯民族模式在後蘇聯時期歐亞空間的複雜歷史遺產。本文強調以下基本觀點：第一，蘇聯民族模式並不是建設常規民族國家的制度，而是一種服務於全球擴張和世界革命戰略的制度設計；第二，蘇聯民族模式雖然存在自掘墳墓的民族主義孵化器傾向，但同時也積極通過各種權力手段，試圖利用和駕馭民族主義浪潮；第三，蘇聯民族模式在塑造一體化方面的成就不容低估，對蘇聯繼承國家的民族認同、地緣政治具有基礎性影響力；第四，蘇聯政治解體具有複雜多重的歷史原因，其與蘇聯民族模式之間的因果聯繫有待繼續探索。

一 起源：對帝國—民族國家轉型的革命性回應

布爾什維克為何執意將俄國改造為一眾民族國家的聯盟？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基於沙俄的多民族性。俄國是地域遼闊的多族群帝國，俄羅斯人在人口數量上勉強超過半數。然而，單純的族群多樣性並不能回答下列疑惑：為甚麼蘇聯會區別於多數現代帝國、執行壓制和消解主體民族的制度設計，而不是採取同化政策、製造「帝國民族」？為甚麼蘇聯要在邊陲地區建立形式上的民族國家，而不是授予特定族群自治權和自治區？蘇聯在彰顯族群多樣性的過程中，為甚麼刻意從語言、地域、文化等「客觀性」層面界定民族，而不是主觀的公民認同？為甚麼蘇聯政權會公開賦予不同族群差異化的官方政治地位——有些族群建立了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有些不被承認為民族？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植根於蘇俄的革命進程。

蘇聯民族模式形成的最基本歷史背景是人類社會在「世紀末」(Fin de Siècle) 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這一轉型自早期現代歐洲就已開始，到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以普選制、普遍兵役制和全民義務教育為特徵急劇加速，並且憑藉西方主導的殖民體系擴散到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隨着德意志、奧匈、奧斯曼、沙俄等傳統帝國解體達到高潮。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年代，摧毀帝國、建立民族國家是絕對的政治正確。迎合這一政治正確固然能夠極大增強革命政黨的動員力與合法性，卻也給信奉「跨國階級聯合重於民族戰爭」的傳統歐洲工人運動帶來了嚴峻挑戰^⑥；蘇聯民族模式由此溯源。它對民族國家轉型的回應是一種創造性綜合：民族國家長期來說會隨着生產力發展而消亡，但短期而言則是「必要的惡」，是統一市場形成、生產力進步、資產階級取代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政治外殼；民族國家的建立並不排斥跨民族的革命大聯合，因此新興的民族解放運動仍須處在統一的無產階級集中領導下。蘇聯民族模式最重要的獨特之處是由此衍生的二分法：布爾什維克堅信語言文化和政治經濟是兩個能夠彼此分離的維度——社會主義運動可以一邊慶祝弱小民族的語言、地域、文化獨立性來反對傳統殖民帝國，一邊通過政治經濟上的高度集中來推進革命和現代化。這構成了蘇聯民族模式的起源。按照美國社會學家布魯貝克 (Rogers Brubaker) 就公民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的分類，蘇聯在起源上是一個族群民族主義與公民超民族主義的組合^⑦。

蘇聯民族模式的實質是以符合民族國家潮流的方式保留沙俄帝國的疆域，其對「統一性」的執念始終居於彰顯族群多樣性之上，但往往受到研究者忽視。對統一性的執念具有多重來源。除了列寧主義所要求的無產階級政黨原則，實際的革命進程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說1917年以前的布爾什維克對於「民族自決」還有某些稚嫩的幻想，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他們很快意識到沙俄帝國是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經濟和防衛整體，任何人要穩固執政，必須持續獲取來自烏克蘭的糧食和煤礦、高加索的石油、中亞的棉花，以及波羅的海沿岸、芬蘭的地緣政治屏障。這意味着重要的邊陲地區都不能置身革命之外，否則革命無法取得成功^⑧。對統一性的執念也是布爾什維克與其對手競爭的產物。沙皇垮台後黨派林立，邊陲民族運動爆發，然而對布爾什維克構成最嚴峻挑戰的大部分全俄政黨都主張保留統一的俄國，而不是任由邊陲地區分離獨立，例如立憲民主黨要求在原沙俄疆域內建立自由的聯邦制度；具有民粹派色彩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則堅持建立俄語和俄羅斯文化主導的新國家；孟什維克右翼也主張限制分離運動，在統一的俄羅斯框架內推進革命；而1918年興起的白衛軍更是堅持俄國不可分裂。這些對手的強大影響力迫使布爾什維克不能在「民族自決」、「肢解俄國」口號上過於認真，而是必須借鑒或採納對手的思想綱領。

在邊陲地區進行的文化與政治革命並非單純的「民族自決」，而是增強蘇維埃統一性的微妙手段。通過支持民族語言教學、鼓勵宗教自由等立竿見影的措施，布爾什維克爭取少數民族支持革命運動、反對白衛軍的進攻，從而深化政治上的跨族群統一。這一「文化—政治」組合率先在共產主義者佔據絕對優勢的韃靼地區實現——通過建立示範性的民族共和國，布爾什維克向沙

俄境內和整個東方殖民世界宣告了一種帝國重組模式。在隨後的革命中，蘇俄政權與民族地區的進步運動、下層民眾結成同盟，在民族政治解放的框架內開展階級革命，消滅原先的統治集團，釜底抽薪地取消了這些舊精英依附民族主義、勾連外部勢力以脫離蘇俄的可能性^⑨。蘇聯民族模式對族群文化的重新發明同樣是鞏固統一性的手段。在布爾什維克話語中，革命前「族群文化元素」包含太多與進步不符的內容，因而需要按照統一的標準加以改造：鄉村土語需要進行現代化，從而轉化為能夠言說工業科技和城市生活的語言；限制婦女外出工作的父權制必須解除；一些傳統的儀式風俗被批判為損害公共健康和人口質量；漁獵游牧生活需要變為定居；對蘇聯其他族群而言，「神秘主義」以及阻礙族群之間溝通的宗教必須取消^⑩。經過蘇聯重新發明的傳統被稱為「蘇維埃現代性」，融合了俄羅斯和蘇聯其他族群的文化元素，是一種族群混合的統一性^⑪。

在王朝合法性崩解、舊疆域無法按照傳統帝國模式重組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極力顯示自己對待劃時代變化的積極態度，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稀釋和重塑作為前帝國中心文化屬性、帶有殖民征服色彩的「俄羅斯性」。沙俄時期斷續曲折地採取了民族國家化政策，以沙皇制度、俄語、東正教和軍事征服精神推進俄羅斯化。這些政策一概被視為革命對象，連同「俄羅斯性」一概受到批判——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將「俄羅斯性」與舊文化等同，認為後者與宗教、專制和殖民存在難以分割的聯繫，且總體上源於知識貧乏、與現代啟蒙成就脫節^⑫。因此，對「俄羅斯性」的再造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俄羅斯」的概念被去主觀化，成為了遼闊地理、豐富自然環境、雄厚工業基礎和歐亞特殊中間位置的代名詞，具有世界革命基地和後方的意涵。遵照列寧「兩個俄國」（革命的俄國和反動的俄國）的指示，對俄國文化革命傳統的系統性發掘也全面展開，除了布爾什維克零散提及的「革命民主作家」，蘇維埃政權開始大規模整理古典文學作品，將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托爾斯泰(Leo Tolstoy)、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的文學遺產重塑為現代化教科書、反專制鬥爭經典和公民文化讀本。在蘇維埃政權的資助下，對革命運動史、勞動和工業史等傳統史學薄弱領域的研究也在內戰時期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下起步。布爾什維克暗中借用人們對波蘭、立陶宛等俄羅斯傳統「重要他者」的敵對情緒，在蘇波戰爭中將紅色愛國主義推到巔峰。通過對「俄羅斯性」的巧妙再造，布爾什維克再一次將俄羅斯文化置於革命的先鋒地位。

蘇聯民族模式對統一性的追求並不局限於內部俄羅斯文化再造和少數民族認同問題（純粹從內部視角觀察容易產生蘇聯片面彰顯多樣性的偏差），而是以攻為守、由外而內，通過輸出革命、支持反殖民運動，從外部根除對俄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政治威脅。這一手法正是在支持「民族自決」的口號下展開的。蘇聯幅員遼闊，族群眾多，有着許多跨國界居住的民族，特別是在靠近芬蘭、波羅的海沿岸、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亞、遠東等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交通的敏感地區。通過賦予這些民族形式上的建國

(以及建立自治區)權力，蘇聯政權試圖吸引其境外同胞回歸，這樣既可以增加勞動力以發展蘇聯經濟，也可以給鄰國造成政治衝擊，增加蘇聯的外交談判籌碼^⑬。蘇聯通過在原帝國邊陲建立一大批形式上的民族國家，積極塑造自身作為世界革命執行人的形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國號暗示了蘇聯不設地理和族群文化的限制，所有國家和社會最終都能夠加入這一國際主義大聯盟^⑭。

支持邊疆民族自決也是革命者面對強權的「次壞」選擇，以保證舊俄國邊界仍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1917年二月革命後，波羅的海、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邊陲地區進入事實獨立階段，建立了領土國家。與此同時，英、法、德等外部勢力在反殖口號下扶持當地獨立運動、發展民族語言教育。這些情況並不讓莫斯科感到愉悅。對此，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數管齊下，一方面採取相同的反殖口號，支持這些政權內部的盟友抗拒外部滲透；另一方面與土耳其、波斯等國達成協議，阻止西方勢力進入相關地區，把多邊關係簡化為雙邊關係。在直接以外交努力阻擋西方大國之外，布爾什維克還爭取少數民族反對西方支持的白衛軍。白衛軍在話語上號召重建「不可分裂的俄羅斯」，致使其在芬蘭、波羅的海、烏克蘭、南高加索和中亞遭遇抵抗，甚至與英法支持者發生齟齬。在力量暫不可及時，布爾什維克通過聲援民族自決來加劇白衛軍的困難處境。對特定邊陲地區民族主義的支持也有利於蘇俄限制外國干涉，比如蘇俄成功利用了亞美尼亞對土耳其、拉脫維亞對德國、白俄羅斯對波蘭的反感情緒，將後者維持在對蘇俄領土完整危害較小的程度^⑮。

當然，把蘇聯建國過程完全化約為理性選擇的策略性計算是錯誤的，蘇聯民族模式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執念和知識基礎。發展民族語言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即時發明。沙俄時期的邊疆學者、人類學家、人種志專家和「東方學家」在革命前已經積累了大量知識，其中一些知名學者如語言學家馬爾(Nikolai Y. Marr)的影響力更是輻射到遙遠的後革命時代。受歐洲浪漫主義思潮影響，俄國東方學家在阿布哈茲、布里亞特等邊陲區域發掘當地語言，編製語法和恢復民間藝術；語言學者聲稱能夠在高加索地區找到歐洲文明的源頭。一些進步傾向的邊疆學者還對佛教等邊陲地區信奉的宗教予以正面評價，認為後者不同於基督教，能夠成為公民精神的載體。這一熾熱的邊疆文化研究趨勢的背後是俄國尋找民族認同的強烈動力，通過發現和彰顯俄國的族群多樣性，證明俄羅斯之於亞洲的西方性以及西方文明內部的特殊性^⑯。這些知識積累在革命前夕已經在學院和研究機構中制度化，在革命過程中則進一步與地方政權形成了緊密合作，進而影響到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選擇。

蘇聯對民族革命的駕馭具有特殊的歷史基礎。沙俄是一個專制的落後大國，一些族群在革命前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然而或止於少數文化精英的自娛自樂，或脫離工農動員而一味追求分離自決、局限於狹窄的政治派別活動不能自拔，還有大量族群只有原始的初級認同。民族意識整體處於初始狀態，使得革命和現代化成了認同形成和再造的契機，而認同重塑也可以反過來推

動革命，將先前分散和陷入內鬥的族群納入革命運動的洪流。彰顯民族語言自主性、推動幹部民族化可以部分滿足民族權利訴求、凸顯革命成就。沙俄在落後的同時，又是一個相對成功的現代帝國。歷經數百年的早期現代化鑄造了地區之間共同市場、經濟聯繫和交通通訊基礎設施，俄羅斯和邊陲地區彼此有了較深的經濟依賴和人員共居，難以通過快速的革命運動切斷。因此，蘇俄可以在時機成熟時運用武力優勢摧毀邊陲地區的獨立政權，將這些區域重新納入蘇俄版圖。最重要的是，蘇俄革命適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動盪重組的時刻。面對俄國遼闊縱深的國土環境，外部勢力的干預既不持久也不堅定，這是蘇聯能夠迅速收回大部分領土的原因，也是其在接下來數十年需要繼續應對多族群問題的緣起。

二 維繫：超越族群多樣性並構築一體化

對蘇聯民族模式的主流批評，即「平權帝國」(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和「歷史的報復」(revenge of the past)理論，認為蘇聯民族模式具有自掘墳墓傾向——通過制度化地培育民族主義，讓國家機器不堪重負，終於為自身的解體鋪平道路^①。按照上述理論，蘇聯自始至終是一座巨型的民族主義孵化器。「平權帝國」和「歷史的報復」理論有諸多弱點，比如認為所有民族意識的覺醒都是蘇維埃國家有意為之，忽略了蘇聯由於戰爭、移民和鎮壓造成的非預期的民族意識形成。這些理論最主要的盲區是蘇聯對統一性的維護。自蘇聯成立之日起，它的歷史就呈現為一種雙重反向運動——既要制度化地持續發明民族、喚醒族群意識，又要從政治上將這些日漸被喚醒的民族牢固地聚合在一起。這對矛盾構成了蘇聯民族模式甚至整個政治、經濟、外交體系演變的動力。蘇聯民族政策既是發明和再造民族的歷史，也是現代帝國駕馭和利用民族主義的歷史。

早在革命年代，蘇聯民族模式的內部隱患就已經呈現，即所謂的「民族/族群多樣性」困擾：一些獨立較早的加盟共和國謀求自主的貨幣和外交政策、從語言文化角度構建民族所產生的巨大成本，經濟上片面扶助弱勢族群在斯拉夫民族中造成的疏離感和無畏犧牲感，執念於「共同地域」強制遷移少數民族產生的嚴重社會和生態問題，民族地區幹部本地化形成的離心風險，以及文化民族演變為政治民族、政治精英與傳統家族部落勢力匯合的趨勢^②。鑒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再中心化」的誘惑從來沒有停止。如何在不正式修改蘇聯聯盟結構的前提下保持各民族的聚合，就成為蘇聯歷代領導人和決策者始終需要考慮的問題。

最簡單粗暴、也最容易引起外界注意的「再中心化」方式就是俄羅斯化。俄羅斯化起源於斯大林與列寧的著名衝突——前者主張所有族群都以自治區而非加盟共和國方式加入「蘇維埃大俄國」，而後者堅持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

盟^{①9}。這次衝突之後，再也難以見到在正式制度層面取消聯盟結構、俄羅斯化的官方行動。斯大林全面執政時期形成了許多重要經驗，其中之一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夠產生震懾效果，有效防止政治民族主義，把族群多樣性限制在語言、文化、地域的「客觀性」框架內；對烏克蘭等區域領導集團和精英知識份子的清洗即是如此。伴隨着集體化的清洗，蘇聯並沒有終止幹部本地化政策，只是警告這一政策必須服從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優先性序列（即所謂的「硬線」和「軟線」理論）。斯大林時期的另一經驗是可以策略性地動員社會上存在已久的族群仇恨情緒，在特定政治議題上實現目標，比如蘇聯為了推動工業化，有意識地動員反猶太、反穆斯林和反烏克蘭情緒^{②0}。此外，將民族問題置於其他議程內以淡化其優先性也是策略之一。面對日益增大的工業化和軍事壓力，蘇聯政權傾向於任用經過短期培訓的俄羅斯人或俄語使用者，這就在實際執行中非期然地削弱了幹部本地化政策^{②1}。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對聯盟結構最粗暴的踐踏大多發生在政權外部安全尚未解決的1945年以前。二戰末期俄羅斯籍幹部佔據了幹部總數的75%以上，有學者甚至因此認為蘇德戰爭是一次相對於共產主義理想的「大撤退」^{②2}。

然而，俄羅斯化只是蘇聯維護統一性努力的很小一部分。延續十月革命後的邏輯，「俄羅斯性」仍然是被限制和被認為需要再造的。蘇聯的策略是加固既有的族群聯邦主義觀念——分割政治經濟和語言文化維度，在堅持政治主權和黨組織統一的同時，把莫斯科以至整個蘇聯建成「世界最優秀文化遺產庇護者」的「第四羅馬」^{②3}。俄羅斯人在蘇聯具有符號性的統治地位，表現在俄語使用和俄羅斯文化的覆蓋性，然而這種統治地位缺乏實際政治權力和結構的支撐——俄羅斯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沒有自己的黨組織、克格勃和科學院，內部還被劃分為多個非俄羅斯自治單位^{②4}。斯大林時期彰顯沙俄帝王和將軍英雄事迹的舉措被批判為恢復封建糟粕，與個人崇拜和沙文主義等量齊觀。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試圖通過經濟科技大躍進、趕超美國、重建十月革命的未來主義導向，以此徹底摒棄斯大林時期重拾沙俄歷史人物、俄羅斯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化的「回向過去」路徑^{②5}。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沒有完全揚棄對俄羅斯文化的支持，而是重點扶持一些斯大林時期以「落後性」為由被打壓的民間藝術，強調其「進步」、「知識性」元素^{②6}。

隨着蘇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一體化措施以更文明的方式進行，並且經常與其他議程並軌而更為隱蔽。出於經濟建設需要，蘇聯積極整合曾經的邊陲經濟體，重建和擴大其與俄羅斯本部的聯繫，力求改變革命前產業分布「內輕外重」的格局。蘇聯在1920年代大力引進和發展經濟地理學，組織專家學者對全蘇疆域和蒙古進行大規模國土勘探，邊陲地區由此被納入全蘇經濟規劃。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機械式理解，蘇聯政權不遺餘力地加強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繫，力求在各族群、加盟共和國之間鑄造難以分離的依存性。長期推行的「社會主義均等化」經濟地理戰略，追求減少落後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異，而把資源利用率、交通運輸成本、區域比較優勢等技術性效率

問題置於次要地位²⁷。蘇聯政權積極推動南高加索、中亞、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開發，力求將這些族群推進到工業化階段，從而建立它們對蘇聯其他地區的經濟依存關係，並以此推進斯拉夫人口（特別是俄羅斯技術人員）的輸入²⁸。當然，建立依附性的措施既不都有刻意的反分離目的，也不總是得到貫徹推行。比如，赫魯曉夫推行的農業墾荒運動由於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一度導致畜牧業發達的哈薩克斯坦成為肉類進口國，但這並不是刻意為之的建立依附性的努力²⁹。

行政區劃上，蘇聯通過任意的邊界劃定來防止分離主義，有時在加盟共和國境內密集建立其他族群的自治單位，有時則是合併自治單位。南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國最初以「外高加索聯邦」形式「打包」加入蘇聯，利用亞美尼亞對工業資源的渴求限制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的獨立傾向³⁰。一些重要的戰略樞紐、出海口以行政飛地形式被刻意保留在蘇共中央直接控制的俄羅斯聯邦轄區，比如加里寧格勒；而克里米亞在多次區劃調整中始終沒有併入毗鄰的烏克蘭。蘇聯還通過邊界重劃隔絕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境外接壤。二戰前夕蘇聯佔領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後，將這些領土劃入西烏克蘭，這樣就實現了蘇聯對摩爾達維亞共和國（蘇聯解體後改稱「摩爾多瓦」）的陸地全包圍³¹。蘇聯在中亞設立的五個斯坦共和國具有明顯的人為邊界性質，旨在建立多個新的民族認同，與革命前已經發生的人口同化趨勢並不完全相符。這些共和國內部的自治區和自治共和國又在不停地調整、取消和重建。

軍事防衛層面，蘇聯則有意識地採取了非均衡安排。在革命時期，許多非俄羅斯族群建立過獨立的武裝力量，布爾什維克政權也曾計劃在部分邊疆地區設置特種少數民族部隊，充分利用其軍事傳統和熟悉地形的本地優勢。不過這些設置逐漸取消，有些是因為少數民族武裝在內戰中自我耗竭、隨兵員補充和武器升級換代而轉化為常規作戰單位，有些則在1930年代被撤銷建制³²。例行化之後的蘇軍確保武裝力量特別是高技術兵種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籍軍人為主（海軍則特別吸收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天然水手」）；非斯拉夫人或者服役於次要兵種如內衛和邊防部隊（以便應對斯拉夫地區的社會抗議運動），或者在指揮層級中居於低端，或者不得駐扎東歐，或者參軍服役人數極少、在本地域沒有軍事院校等基礎設施，或者幾乎沒有軍事力量駐扎。軍人被要求在遠離鄉土的地域服役，每個軍事單位盡可能保持族群比例的固定配置³³。

最激進的努力出現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蘇聯在有限度俄羅斯化、「蘇維埃國際主義」和締造「蘇聯民族」三個選項之間搖擺與混合。如果說「蘇維埃國際主義」是俄國革命和蘇聯建國的「原教旨」，那麼有限度俄羅斯化就是運用俄語、俄羅斯文化符號來同質化多族群共同體的保守方式，而締造「蘇聯民族」則是對「蘇維埃」概念族群化甚至種族化的激進嘗試³⁴。文化意識形態的重要一面是確保族群意識限制在文化和藝術層面，防止族群認同轉變為挑戰政治統一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措施表現在：積極介入重塑和發明特定族群文

化，建立人員組成多樣化的管理機構，任用革命後培養的大學院校學生、族群宗教研究學者、大眾動員積極份子來稀釋原先的宗族和宗教社區領袖的勢力³⁵；重建族群文化、促使其與蘇聯制度和其他族群適應，對特定族群的革命前文化做了大幅修改，去知識化、去宗教化甚至去儀式化³⁶，大幅引進革命前的下層文化、民間藝術來對抗「資產階級」、「僧侶階級」元素——這些「新傳統」通常是對革命年代某些現代化左翼（如伊斯蘭改革運動）的某種借鑒和繼承³⁷；切割非俄族群的境外聯繫——蘇聯可以利用特定族群影響其境外同胞，但限制境外力量對蘇聯施加反向影響力；塑造內外有別的面向，對外展示蘇聯扶助非俄族群的正面形象、贏得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好感，對內則限制族群意識的政治化³⁸。蘇聯的改造確實創造了新傳統，比如對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改造混合了蘇式共產主義理念和伊斯蘭教義，並結合俄國特定區域的文化特徵，以至在後蘇聯時期仍然保持着頑強韌性³⁹。

蘇聯的對外戰略延續了十月革命以攻為守、從邊界以外保衛內部的思路。因此，彰顯多樣性的民族模式在蘇聯決策層看來反而是優勢而非負擔。即便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引發了嚴重的邊境民族外逃現象，蘇聯政權仍然通過繼續加強族群聯邦主義（「文化民族」+親蘇國際主義）、建立更多自治區來安撫在社會革命中受到重創的非俄羅斯人，從而既能繼續推進酷烈的經濟社會改造，又能減輕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合法性壓力，保持蘇聯的意識形態優勢。這一策略經過二戰前的反覆實踐，在美蘇冷戰期間迎來巔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擴散與英、法、荷、西、葡傳統殖民帝國的瓦解同步進行。美蘇作為後起的側翼大國，是反殖運動的受益者和推動者。遵循族群聯邦主義原則，蘇聯以民族國家建設者自居，成為第三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化的推手——蘇聯把境內穆斯林作為武器，擴大在中東世界的影響力⁴⁰。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這種行為在反殖浪潮、兩極對抗年代具有普遍性。一戰後的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二戰後美國的全球反殖運動、南斯拉夫和中國對反殖運動的介入都對蘇聯構成競爭，同時也將蘇聯的以攻為守路線合理化。

三 終結與遺產：後蘇聯空間的生存彈性

蘇聯解體被認為是蘇聯民族模式徹底失敗的標誌。然而，並不能因為蘇聯政權終結而否認一些重要事實：在看似自相矛盾的雙重反向運動中，蘇聯畢竟穩定存在了七十年，其崩潰的觸發機制並非民族問題，而是地緣政治壓力下精英合法性喪失引起的自我毀滅性改革；蘇聯解體過程相對和平，沒有像南斯拉夫和後殖民世界那樣爆發全局性的內戰；政治解體沿着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邊界線發生，然後迅速穩固，並未陷入無休止的分裂；後蘇聯空間（Post-Soviet Space，指前蘇聯領土）主權國家之間殘存着高度的一體化，這種統一性即便在歐盟和北約東擴的情況下仍保持着相當彈性；俄羅斯在後蘇聯

空間表現出更不受約制的新帝國主義傾向，頻繁對前蘇聯「兄弟國家」使用經濟槓桿甚至動用武力；蘇維埃認同、跨國界認同在後蘇聯空間普遍存在，給後蘇聯國家的民族建設帶來嚴峻挑戰，在摩爾多瓦、亞美尼亞、東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更是締造了一眾「事實國家」^④。這些都提醒我們，蘇聯長期以來營造統一性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勞的，蘇聯在發明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多處布局，對蘇聯民族模式予以全面否定似乎並不合適。

蘇聯解體過程中，精英對於民族主義是勉強接受而非熱烈擁抱。族群問題只是政治精英推動鬥爭的工具，而非初始目標。蘇聯憲法規定各加盟共和國具有主權，這是蘇聯建國神話的一部分，用作共產黨內的政治鬥爭武器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只要維持經濟交通一體化和軍事鎮壓能力，民族主義將有助於削弱當權者，卻不可能演變為成功的分離運動。在這一認識的指導下，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和葉利欽(Boris Yeltsin)都積極鼓動自下而上的地方民族主義，試圖以此贏得地方支持、打擊政治對手。這種革命思維一直延續到後蘇聯初期——為防止蘇共捲土重來，葉利欽鞏固並延續了蘇聯遺產，實質性地擴大各聯邦主體主權^⑤；俄羅斯也開放了境外組織對本土民族運動的支持，假定境內伊斯蘭運動都已經世俗化、不可能帶來分離主義威脅^⑥。這些看法不是沒有基礎的——直到最後一刻政治精英仍然拒絕相信蘇聯會徹底解體，即便是最早提出蘇聯解體的斯拉夫核心國家，也沒有一步到位地主張獨立主權，而是堅持某種形式的聯盟，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斯拉夫聯盟、俄羅斯—烏克蘭二元國家、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切割而保留蘇聯剩餘部分等^⑦。

至於蘇聯長期構築的基礎設施、經濟和國防領域的一體化是否起到了預期作用，答案非常複雜。一體化的後果清晰存在，蘇聯解體造成了大面積的經濟停滯和安全防務混亂。在蘇聯時期嚴格的部委垂直管理下，企業和區域之間缺乏制度化和正式化的資源交換。一旦崩解突然到來，它們瞬間需要面對從來沒有遭遇過的變局。即使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些輸出技術和人才的經濟核心成員國，面對突如其來的脫鈎，也遭遇了供給和輸出渠道斷裂、管理經驗不足、行政機構癱瘓、技術人口外遷等嚴重問題^⑧。至於安全防務上則出現了繼承國家的軍隊集體性的訓練和戰鬥力下降，許多實行軍事硬脫鈎的國家長時間不能建立有效的防衛能力，大量武器裝備被倒賣、盜竊和搶劫，導致領土和族群爭端暴力化^⑨；毒品交易、走私、恐怖襲擊等非傳統威脅也集中爆發。嚴峻的後果迫使多數國家放慢步伐，不同程度地回到某種集體安全機制，也為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選擇性干涉行動提供了機會^⑩。蘇聯遺留在各加盟共和國領土上的俄羅斯移民、少數族裔則構成了重大問題，這些人口擔心會成為繼承國家推行民族同化的犧牲品，積極尋求母國的保護，又反過來加劇了新政權對他們的不信任。

影響一體化效果的因素是複雜的，無法歸結到單一向度。首先，理性選擇具有一定解釋力。一個民族或族群在蘇聯基礎權力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和融入深

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切割的代價。在蘇聯體系中佔據關鍵位置的民族並不容易從技術上迅速脫離——儘管它們在話語上可以非常激進，但是這種激進會逐漸回到慢速甚至停頓狀態，因政治家不堪承受巨大成本引起的公共壓力和行政癱瘓。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族群不遺餘力地脫鉤。其次，民族認同的影響力也不能否認。雖然在波羅的海、西烏克蘭等地區反俄情緒沒有消除，超民族的「蘇聯認同」也確實存在，並與特定地區的區域認同結合在一起（比如蘇聯的「工業鐵鏽地帶」），成為繼承國家構建民族認同面臨的挑戰⁴⁹。再次，外部援助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那些預期可以從文化相似度較高的鄰國取得援助的民族國家（比如波羅的海國家之於北歐，猶太人之於以色列，德意志人之於德國，摩爾多瓦之於羅馬尼亞），會不計代價地脫離蘇聯；反之，沒有此類文化資源或預期的國家則繼續倚靠俄羅斯和前蘇聯體系⁵⁰。

一個地區在蘇聯解體時經歷的動態過程也是影響脫鉤的重要因素。一些激烈的脫鉤行為實際上是由偶然事件和缺乏行政經驗觸發的。蘇聯時期一體化措施的設計假定體系處於穩定狀態，因而無法應對民主化、主權分割、戰亂、地緣政治重組等無法預測的情景。蘇聯解體過程總體和平，但局部地區的內戰、邊界衝突和叛亂仍然致使一些政權迫切需要分割蘇聯遺產，以獲得立即可用的作戰和經濟自持能力，而另一些地區則由於獨立而需要獨自應對近鄰的傳統安全威脅和新生恐怖主義⁵¹。至於這種需求如何影響脫鉤，又與一個民族國家原先的技術和人力儲備有關。蘇聯的「工業化邊陲」和跨加盟共和國移民項目對阻滯脫鉤的作用也是多面相的。在中亞地區，俄裔和工業人口都在反對貨幣去盧布化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角色，而在波羅的海，他們被當作間諜，率先成為當地政權驅逐或強迫歸化的對象⁵²，可見單純的「製造依附性」（engineering dependency）對後蘇聯空間並非全無影響，但也不能規制新興獨立國家的行為。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蘇聯深度經營了工業體系和軍事部署。當地精英因此相信可以佔據這些資源用作獨立談判的籌碼，甚至將其轉換為軍工、旅遊療養資源盈利。此外，每個政權的政治特質也會影響脫鉤軌迹。權力集中程度、對社會壓力的敏感性、精英的行政經驗（不少後蘇聯精英是沒有政治經驗的前異見人士或草根選舉領袖）等，都會影響一個政權對脫鉤進程的判斷⁵³。

在個體層面，一體化的後果也帶有複雜性。蘇聯政權鼓勵跨族群通婚，認為這類婚姻可以淡化族群認同，實現「蘇維埃民族融合」，而戰爭造成的移民、城市化、無神論教育和混居模式也確實塑造了大批跨族群婚姻。然而，這些通婚對子代族群認同的影響是多層次、不平衡的，取決於地域、通婚族群在蘇聯民族體系中的等級序列等多種因素。在中亞地區，與俄羅斯人通婚產生的跨族群後代更傾向於認同當地的「加盟共和國民族」；在白俄羅斯等國，此類婚姻則產生了俄羅斯認同；俄羅斯人與「非加盟共和國民族」的通婚強化了俄羅斯認同⁵⁴。大量散居在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並沒有形成完全同質性的跨國界民族認同，因而也不像二戰前的德國移民那樣成

為母國滲透、重新收回「舊疆界」的工具。不同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因其社會地位不同，選擇了不同層次的歸化程度和策略，有些則不堪忍受新政權迫害少數族裔的反向民族主義而遷出⁶⁴。語言對認同形成的作用也十分複雜——後蘇聯空間各個時期都存在大量俄語流利但堅持本民族認同的非俄羅斯居民⁶⁵。

後蘇聯空間統一性的重要推動力來自俄羅斯。相比蘇聯時期隱晦、受制約和接受再造的「俄羅斯性」，俄羅斯新帝國主義在表現形式上更為公開，意識形態內容上則日漸保守。俄羅斯國族建構與普京(Vladimir Putin)的個人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包含着諸多複雜因素，包括個人崇拜的威權統治、君主制的儀式和審美，以及男性氣概⁶⁶。對「男性氣概」的推崇不僅構成普京個人的合法性基礎，還拓展成對俄羅斯整體國家形象男性化(masculinity)的讚頌，以及帶有貶低色彩地把俄羅斯周邊對手類比為父權制下的女性⁶⁷。普京治下的官方民族主義還宣揚被革命廢棄的保守價值觀，弘揚父權制、反同性戀運動以及東正教傳統。俄語作為後蘇聯空間建構的重要工具獲得官方支持，但延續了蘇聯末期的「街頭風格」——在削弱政治攻擊性的同時，也納入了大量黑幫語言、俚語和髒話⁶⁸；透過衝突製造「他者」也是塑造民族認同的方式。俄羅斯徹底將民間存在已久但在蘇聯時期受到壓制的反烏克蘭情緒官方化。普京將烏克蘭塑造為俄羅斯的重要對手，在宣傳上把烏克蘭顏色革命與法西斯運動、新納粹相聯繫。這些做法在2014年俄羅斯奪佔克里米亞時達到巔峰，之後則演變為綿延不絕的東烏克蘭戰事。

四 結論：革命、帝國與民族主義

1922年後的整個蘇聯歷史即是俄國革命的漫長延續，是一場試圖發明、釋放、駕馭和操控民族主義的實驗。顯而易見的是，這場實驗並沒有隨着蘇聯解體而終結。目前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美俄關係、歐俄關係出現新動向，斷言蘇聯民族模式徹底失敗、歐亞空間分崩離析為時尚早。本文勾勒了一幅革命借用帝國結構駕馭和操縱民族主義、同時以民族主義改造傳統帝國空間的歷史畫卷。蘇聯的歷史經驗表明，帝國是民族主義背後的推手。面對民族國家崛起的壓力，帝國遠比城邦、部落等小型傳統政體更敏銳也更有迴旋餘地，能夠以退為進、以攻為守，把自身打造為民族解放的旗手，通過馴化民族國家大幅增強自身的生命力。在世界範圍內，蘇聯的這一創舉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眾所周知，民族主義興起於十九世紀後半葉，但長期受制於巨型帝國的霸權。直到二十世紀60、70年代各傳統帝國完全崩解(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世界才逐漸轉型為民族國家體系。美蘇爭霸在這一歷史轉變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美蘇都以反殖革命建國，地緣上處於傳統歐洲側翼外圍，接近歐洲海外殖民地；作為後起國家，它們有動力通過反殖趕超

和取代傳統霸主。在支持民族解放的旗號下，美蘇在原殖民地世界爭奪人心，推動民族主義革命，建立親蘇/親美的新興民族國家。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最終形成與蘇聯民族模式密不可分，正是美蘇這樣的全球帝國最終奠定了民族國家的世界主導地位。

蘇聯經驗亦表明，民族問題只是帝國政治大棋盤中的棋子之一，民族問題既不是帝國的唯一關切，也不能決定帝國的生死。在革命大框架下，帝國與民族主義的關係是綜合和立體的，民族認同的培育鑲嵌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革命性社會結構改造和地緣政治博弈等諸多議題中。民族問題在蘇聯大部分時期處於邊緣，被氣勢恢宏的社會改造、經濟建設、邊疆開發、戰爭行動所遮蔽，蘇聯的革命輸出和全球擴張更是讓許多早先的邊疆成為了安全的內陸（比如東歐納入蘇聯勢力範圍後的西烏克蘭）。綜合的帝國國家建設構築了強大的結構，使得單純的民族意識覺醒並不能導致帝國的瓦解。沙俄垮台和蘇聯解體後的歷史還表明，個別帝國政權的衰亡絕不等同於帝國核心控制力的終結，也不意味着帝國共同空間的消失，更不等同於帝國模式的消亡。蘇聯的歷史教訓在於，帝國對民族主義的操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混合着預期和非預期後果。粗糙的計算和意外的事件，都可能導致帝國被民族浪潮反噬，而駕馭民族主義的冒險實驗又極大增加了帝國協調內部衝突、外交、經濟、軍事的複雜性，加大了內部腐化、發展失速和體制僵化的概率。複雜的民族關係平衡牽制着蘇聯的經濟模式、外交戰略和軍事布局。蘇聯開創了傳統帝國應對民族主義的新模式，但在現代國家建設的綜合能力上弱勢顯著，這是其駕馭民族主義不能完全得心應手的最主要原因。

註釋

① John Darwin, "Empire and Ethnicity", in *Nationalism and War*, ed. Siniša Malešević and John A. Hall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7-71; Stefan Berger and Alexei Miller, eds., *Nationalizing Empire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aymond F. Betts, *Decolo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Mary-Jo DelVecchio Good et al., eds., *Postcolonial Disord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③ Davi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④ Pål Kolstø, "Is Imperialist Nationalism an Oxymor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 no. 1 (2019): 18-44.

⑤ 關於蘇聯民族模式核心特徵的論述，參見 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no. 2 (1991): 196-232;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no. 2 (1994): 414-52;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remy Smith,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Francine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⑦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⑧⑫ Luyang Zhou,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as Foes and Friends: Comparing the Bolshevik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no. 3 (2019): 313-50.

⑨ Hélène C. d'Encausse, *Islam and the Russian Empire: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trans. Quintin Hoa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⑩ Olle Sundström, "Shamanism, Politics and Ethnos-Building in Russia", 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d. Greg Simons and David Westerlund (Farnham, UK: Ashgate, 2015), 75-98.

⑪ Tarik C. Amar, *The Paradox of Ukrainian Lviv: A Borderland City between Stalinists, Nazis, and Nationalis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⑬ David Marples, *Belarus: A Denationalized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7-28;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 no. 4 (1998): 833-34.

⑭ Jeremy Smith,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

⑮ Andrew Ezergailis, "The Thirteenth Conference of the Latvian Social-Democrats, 1917: Bolshevik Strategy Victorious", in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 Ralph C. Elwood (Cambridge, MA: Slavica Publishers, 1976); Anahide T. Minassian,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897-1912)", in *Transcaucasia,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ed. Ronald Sun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⑯ Vera Tolz, *Russia's Own Orient: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⑰ 參見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⑱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813-61; Irina Mukhina, *The Germa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Anne Applebaum,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New York: Doubleday, 2017).

- ⑲ V. I. Lenin, *Lenin's Final Fight,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22-1923* (New York: Pathfinder, 2010), sec. 2, 9.
- ⑳ David Priestland,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 Ideas, Power, and Terror in Inter-War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㉑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 ㉒ Nicholas S.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48).
- ㉓ 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㉔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414-52.
- ㉕ Yitzhak Brudny, *Reinventing Russia: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1953-199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㉖ Andrew Jenks, "Palekh and the Forging of a Russian Nation in the Brezhnev Er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4, no. 4 (2003): 629-56.
- ㉗ Peter Kirkow, *Russia's Provinces Authoritarian Transformation versus Local Aut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 ㉘ Gertrude Schroeder, "Nationalities and the Soviet Economy", in *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Lubomyr Hajda and Mark R. Beissing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 ㉙ Konuralp Ercilasun, "Soviet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Cultivating 'Virgin Lands' in Kazakhstan",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Life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Soviet Era*, ed. Timur Dadabaev and Hisao Komatsu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53-65.
- ㉚ Ronald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㉛ Helen Fedor, *Belarus and Moldova: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5), 106.
- ㉜ Scott R. McMichael, "National Formations of the Red Army, 1918-38", *The Journal of Soviet Military Studies* 3, no. 4 (1990): 613-44.
- ㉝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Nationalities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in *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72-94.
- ㉞ Eric D. Weitz, "Racial Politics without the Concept of Race: Reevaluating Soviet Ethnic and National Purges", *Slavic Review* 61, no. 1 (2002): 1-29.
- ㉟ Shoshana Keller, *To Moscow, Not Mecca: 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Islam in Central Asia, 1917-194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 ㊱ Galina Yemelianova, "Islamic Radicalisation: A Post-Soviet, or a Global Phenomenon?", in *Radical Isla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d. Galina Yemelianov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1-30.
- ㊲ Ade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 ㊳ Galina Yemelianova, *Russia and Islam: A Historical Survey*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㊴ Dominic Rubin, *Russia's Muslim Heartlands: Islam in the Putin Era* (London: Hurst & Co., 2018).
- ㊵ Alexandre Bennigsen et al., *Soviet Strategy and Isl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 ④① Kristin M. Bakke et al., “Dynamics of State-building after War: External-Internal Relations in Eurasian *de facto* States” ,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63 (March 2018): 159-73.
- ④② Konstantin Zamyatin, “Russian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and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From a Multinational Federation towards a Nation-State” ,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15, no. 1 (2016): 19-49.
- ④③ Roland Dannreuther, “Russian Discourses and Approaches to Islam and Islamism” , in *Russia and Islam: State, Society and Radicalism*, ed. Roland Dannreuther and Luke March (London: Routledge, 2010), 9-25.
- ④④ Serhii Plokyh,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309.
- ④⑤ Hans van Z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④⑥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and Daniel Zirk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and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④⑦ Susan Clark,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Defining Security Priorities and Developing Military Forces” ,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Kazakh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Kyrgyzstan, and Turkmenistan*, ed. Michael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4), 177-206.
- ④⑧ Roman Szporluk, “Nationalism after Communism: Reflections on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Poland”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 no. 3 (1998): 301-20.
- ④⑨⑤② Luyang Zhou, “After Empir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Military System” ,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 no. 2 (2020): 216-33.
- ⑤① Mark Beissinger, “State Building in the Shadow of an Empire-State: The Soviet Legacy in Post-Soviet Politics” , in *The End of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S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157-85.
- ⑤② Jeff Chinn and Robert Kaiser, *Russians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Republ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⑤③ Dmitry Gorenburg, “Rethinking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the Soviet Union” , *Post-Soviet Affairs* 22, no. 2 (2006): 145-65.
- ⑤④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⑤⑤ Vera Tolz, “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 in Nation-States and Empires”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 no. 1 (2019): 85-89.
- ⑤⑥ Tatiana Mikhailova, “Putin as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His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 , in *Putin as Celebrity and Cultural Icon*, ed. Helena Goscilo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65-81.
- ⑤⑦ Oleg Riabov and Tatiana Riabova,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Rus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under Vladimir Putin” ,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 no. 2 (2014): 23-25.
- ⑤⑧ Michael S. Gorham, *After Newspeak: Languag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